朱承 著

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

《礼记》与儒家政治哲学范式研究

人民出版社

朱承 著

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

《礼记》与儒家政治哲学范式研究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段海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礼记》与儒家政治哲学范式研究 / 朱承 著 .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9
ISBN 978－7－01－021360－6

I. ①礼… II. ①朱… III. ①礼仪－中国－古代 ②《礼记》－研究
IV. ① K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08405 号

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
LIYUE WENMING YU SHENGHUO ZHENGZHI
——《礼记》与儒家政治哲学范式研究

朱 承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天津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1000 毫米 1/16 印张：22.25
字数：260 千字

ISBN 978－7－01－021360－6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通过对《礼记》及相关礼乐文献的梳理，分析了儒家传统中的交往礼仪、生活规范和礼治信念，特别是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阐释了礼乐文明中所具有的“生活政治”特质。

全书围绕《礼记》中所制定的礼乐制度及其所展现出来的礼治精神，讨论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与政治观念、生活嘉益分配与政治秩序维系之间的关系，思考了“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发现政治价值”以及“政治观念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落实”等问题，诠释和重构儒家礼乐文明所展现的政治哲学范式。

作者试图通过发掘“依据政治价值规范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安顿政治信念”的政治智慧，为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提供一种“生活政治”的理论视角和解释范式。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出 版 资 助

目　录

绪　论……1

第一章　何为“生活政治”……13

一、“生活政治”的厘定……17
二、“生活政治”的体现……25
三、“生活政治”的意义……33

第二章　礼乐文明与生活政治……41

一、礼乐文明是一种“生活政治”……44
二、日常礼乐实现了“不要政治的政治”……59
三、“生活政治”可能模糊公私边界……67
四、现代生活要求转化礼乐文明……75

第三章　礼乐生活与自然天道……87

一、人情本于天道……91
二、大礼与天地同节……97
三、凡举大事必顺其时……104

第四章　生活规范与政治秩序……113

一、生活规范与礼仪制度……116
二、平民的生活规范……121
三、政治人物的生活规范……129
四、生活规范与等级秩序……138

第五章　衣冠制度与生活政治……151

一、作为等级符号的衣冠……154
二、衣冠的政治象征……163
三、衣冠的“束缚”……171
四、“衣带渐宽”与生活自由……179

第六章　饮食之道与生活政治……187

一、饮食、政治认同与情境规范……192
二、食物分配与身份等级……200
三、食物、秩序与特权……205
四、饮食与公共交往活动……211

第七章　宫室居住与生活政治……223

一、宫室居所与政治象征……227
二、空间方位与权力差异……238
三、死后墓所与身份等级……244
四、“卑宫室”与居住平等……249

第八章　车舆行进与生活政治……257

一、车舆礼仪与政治生活……260
二、行进先后与身份地位……267
三、日常交通与现代政治……278

第九章　乐舞审美与生活政治……287

一、“乐”本乎人又成就人……290
二、圣人、先王作“乐”……296
三、“乐”与政通……307
四、“乐”之政治功效……315

结　语……328
参考文献……339
后　记……348

绪　论

礼乐的制定及其操作性、有效性的判定，始终是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一项核心内容。故而，人们往往称中国古代的政治为“礼治主义”。“导民以礼，风之以乐。”[①] 作为一种制度性和规范性的存在，礼乐制度与风俗系统长期以来是传统中国社会赖以建构国家政治文明和社会生活文明的基石。“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礼记·礼运》）可以说，缺乏对礼乐文明的理解，也就难以深入理解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公共政治生活以及私人家庭生活，从而难以把握传统中国社会的内在机理和运行机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礼乐制度的传递形式各异，或存在于政治与生活实践的展开中，或存在于风俗、传统的传续中，或存在于经典文献的薪火相传中。而由于时代的变迁，无论是政治与生活实践，还是风俗传统，在追溯礼乐制度的根源时，都倾向于从早期的儒家经典里去寻找根据。

①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页。

从现存文献来看，集中记载儒家礼乐制度的经典是所谓的“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在礼仪实践的角度上来说，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早期儒家的《周礼》、《仪礼》、《礼记》三书中所记载的具体仪节也在不断地变化，但“三礼”中所蕴含礼乐文明的精神却一直在延续，直到以现代性精神为圭臬的当今时代，这三部重要的礼书也仍然有着其独特的思想资源意义。特别是《礼记》，概括了先秦儒家礼制的核心内容，并从义理层面对礼乐文明作出了深刻的阐释，其所承载的礼义精神对于儒家礼乐文明影响深远。大体而言，虽然《礼记》里所记录的先秦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仪节，不一定会被后世人全盘延续或者照搬照抄，但其所代表的“差异性秩序精神”却被较为完整地继承下来了，成为中国传统礼乐文明的核心要义。这里所谓的“差异性秩序精神”，既是指政治层面的，也是指生活层面的；既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也是传统社会的生活文明。就政治层面讲，这一秩序精神体现在尊崇王权、维护政权统治、保证权力稳定过渡、巩固身份等级等方面；就生活层面讲，这一秩序精神体现在劝导人们各守其分、保障社会的公序良俗、传递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礼让精神以及促进家庭生活和谐等方面。由此而言，对《礼记》中所记载的政治与生活的礼仪规范予以细致分析，探索“如何在生活中发现政治”以及“如何将政治推行到日用常行中”等问题的解答，大致上可以对中国古代特别是儒家政治文明和生活文明的秩序精神有所领会。

一般认为，《礼记》成书于战国至秦汉之际，作为一种汇编性质的礼书，它分门别类地整理和总结了先秦社会生活中的礼仪、风俗，并且在理论上说明了礼乐精神的崇高性、必要性与合理性。自《礼记》成书后，特别是被汉代儒生奉为经典后，逐渐为读书人广泛研习，其记载的

内容或直接或间接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多有使用。对于《礼记》的研习、使用以及对于其中的礼乐精神予以阐扬，使得《礼记》在古代中国逐渐开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社会、政治和教育及教化的现实性作用，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学术思想层面对人们有所启迪。历代学者对《礼记》的持续研究，为《礼记》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从目前的文献来看，至少自东汉郑玄以来，学者就开始不断展开包括《礼记》版本、文献、名物、思想等在内的各种研究。两千多年来，研究《礼记》及其单篇的文章、著作路数庞杂、成果丰富、蔚为大观，对这些成果在此不能完全列举。从学术史的角度，抛开专门针对《礼记》单篇展开研究的成果，仅看从整体角度对《礼记》进行考证、研究的成果，我们认为，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礼记》的研究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是从古典文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主要是对《礼记》文本内容的校勘、训诂等。如郑玄、陆德明、孔颖达、卫湜、陈澔、阮元、王引之、朱轼、孙希旦、朱彬、丁晏等古代学者，对《礼记》文献本身的校勘、训诂都做了具有历史价值的探究，有的还从知识性的角度还原了早已失传的称谓、礼器、礼仪程序等，这是今天我们探究《礼记》名物制度、语言文字、义理思想的主要文献基础。另外，现代以来，由于白话文的出现，对于传统经典的现代汉语注释和翻译中实现意义的重现，也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对《礼记》全书的现代汉语译解也属于此思路，主要有王梦鸥的《礼记今注今译》、杨天宇的《礼记译注》、吕友仁的《礼记全译》、王文锦的《礼记译解》等，这些《礼记》的现代汉语表达形式对于人们传习经典、了解传统文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广作用，故而既具有学术意义，也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

第二是从文献版本考证的角度进行研究，主要是对《礼记》来源的考证，包括作者、成书年代等。如传统儒家郑玄、陆德明、孔颖达、朱熹、钱大昕、吴承仕、丁晏等，现代文史名家吕思勉、洪业、沈从文等，以及当代学者王文锦、彭林、龚建平、王锷都有专论，对《礼记》成书过程、版本流传都做了细致的考辨与介绍。从文献学的角度对于《礼记》成书过程和文献本身的构成作出一定意义上的还原，从而试图澄清《礼记》成书的思想背景。虽然从古到今围绕这一问题的结论多有不一，但对《礼记》的儒家学派属性、《礼记》全面记载了至迟西汉初年以前的社会生活礼仪制度及风俗、有多名作者参与了记录和撰写《礼记》等观点，总体上还是取得了广泛的共识。随着近年来出土文献的增加，对此问题或有更进一步的认知可能，如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中部分文献和流传的《礼记》有内容上的相近处，故而，类似于郭店楚简的发掘与考证也大大推动了当前《礼记》文献的研究工作，从源头上为我们逐渐廓清了《礼记》文本的来源。

第三是从哲学思想的角度进行研究，主要是宋学方法和现代哲学诠释下的成果。换句话说，这主要是从义理的层面来解释《礼记》的哲学意义和思想蕴涵。如宋明诸儒、王夫之、康有为以及近年来龚建平、林素玫等的思想发挥以及通释和通论的著作，如朱熹对于《礼记·大学》、《礼记·中庸》两篇的创造性解释，带来了整个中国哲学与思想的变化，使得《礼记》的思想得到了崭新的发展。当然，除了一些通论性的判断，朱熹并没有对《礼记》全书做一完整而又成体系的诠解。进入现代学术范式以来，对于《礼记》的哲学研究呈现扩大化趋势，无论是《礼记》单篇的哲学发挥，还是《礼记》全书以及部分思想的哲学式解读，都出现了很多观点新颖的成果。关于《礼记》的整体性研究中，近年来

的龚建平所著《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以及《〈礼记〉功夫论研究》，跳出解读传统礼仪知识及意义的做法，转而运用现代哲学方法分析《礼记》，做了富有创见的哲学解读；林素玫则从人文美学的角度对《礼记》展开了整体性研究，形成《〈礼记〉人文美学探究》一书，从一个新的角度拓宽了《礼记》的理论论域。哲学思想意义上的《礼记》诠释，使得这一古老文本不断地推陈出新，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思想特别是礼学思想。

从整个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在哲学学科化之前，《礼记》研究主要集中在《礼记》（大戴记、小戴记）的真伪同异、《礼记》诸篇的形成年代和作者的众说纷纭、文字的训诂注释或者集释上，而对即成的通行《礼记》一书（除《大学》、《中庸》等外）的哲学思想相对关注较少，这就使得《礼记》的意义世界尤其是思想意义、政治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考据辨伪、训诂注解遮蔽了。应该说，从理解经典的方法来看，考据辨伪、训诂注解为哲学诠释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哲学诠释为经典的意义再生提供了可能，二者对于经典的传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考据则无客观事实和历史依据，无诠释则无义理生发和思想创造，二者不可或缺其一。另外，近代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对所谓礼教的猛烈批判以及礼教对于人性的压制和传统专制政治体制的反思，使得《礼记》研究往往会被视为“抱残守缺”的行为，立场优先的政治气氛也制约了《礼记》之哲学探讨的深入。当然，在现代化尚未完成、现代性价值尚未完全确立的现代中国，通过《礼记》为古典的生活束缚、传统专制以及身份等级制度张目也同样会将《礼记》研究带入歧途。

为更好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反思传统价值并实现其与现代价值的融合，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考辨训诂以及立场优先的批判之外，继续

采用现代哲学诠释的方法和视角，在现代性学术问题的背景下，深化对于《礼记》的理解，对《礼记》进行深入的分析、诠释，展现其深层的义理和哲学的价值与困境，发掘其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乃至人类世界的意义和启示。关于《礼记》的哲学诠释问题，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如郭齐勇曾经专门提出《礼记》哲学诠释的向度问题，指出要从终极性与宗教哲学、生态环保伦理、政治社会哲学以及道德哲学等向度对《礼记》进行现代哲学意义上的阐释。[①] 梁涛也屡次倡导，要将《礼记》和《论语》、《孟子》、《荀子》一起作为“新四书”[②]，来展开对儒家哲学及儒家道统的研究。从哲学特别是政治哲学层面深化对《礼记》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古人的社会制度安排以及中国传统社会风俗的根源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能从理论上为中国古代礼治社会的形成、运行和固化作出一定的解释。从内容上看，《礼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礼治精神的阐发，而礼治精神关乎儒家政治哲学核心的内核，故而有必要加强对于《礼记》的政治哲学研究。

20 世纪以来，礼学、礼教虽被作为“封建”糟粕、专制渊薮曾遭挞伐，但在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批判之外，学术界、思想界对《礼记》社会政治价值的研究也屡见硕果。如李安宅在《〈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一书中，对《礼记》进行过社会学研究，从礼乐、知识、宗教与仪式、社会组织和政治等多方面对其作了全面分析和梳理；

① 参见郭齐勇：《〈礼记〉哲学诠释的四个向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

② 参见梁涛：《“新四书”与“新道统”——当代儒学思想体系的重建》，《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 年第 3 期；《“新四书”与当代经学的重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 年第 4 期。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长篇论述了《礼记》的封建宗法主义；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对《礼记》与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的影响作出过深入分析；勾成益在《先秦礼学》一书中认为《礼记》是先秦礼学的集大成；崔大华认为，在“礼”的社会生活实践方面，《礼记》比孔子与荀子观察得更为全面，考察得更为周延；[①] 刘泽华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认为《礼记》中的民本、爱民思想与其中的君主专制思想并不矛盾；龚建平在《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中认为，《礼记》中所反映的政治思想既反映了儒家的礼乐教化，也反映了儒家政治的自我节制；盛邦和认为，《礼记》中的礼义、礼节和礼仪是中国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资源之一。[②] 另外，还有一些论著集中关注《礼记》单篇政治哲学思想，如陈明对《礼记·大学》的政治解读[③]、胡伟希对《礼记·礼运》的社会乌托邦思想[④]、郭齐勇对《礼记·王制》中的社会公正思想[⑤]等等，这些研究使得对《礼记》政治哲学意义的发掘走向深入，并拓展了《礼记》的研究维度。近些年来，随着政治哲学研究热潮的兴起，由于《礼记》具有鲜明的规范性色彩、秩序性特质，所以从政治哲学角度来研究《礼记》的成果也越来越多，这也说明对《礼记》所展开的政治哲学研究方兴未艾。

上述研究都细致诠释了《礼记》的政治思想，然而从总结和概括的

① 参见崔大华：《论〈礼记〉思想》，《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4期。

② 参见盛邦和：《〈礼记〉与中国礼文化》，《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③ 参见陈明：《儒者之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 参见胡伟希：《作为政治哲学的儒家社会乌托邦——兼对〈礼记·礼运〉的分析》，《哲学研究》2007年第7期。

⑤ 参见郭齐勇：《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角度来看，在学术界已有的成果中，总体上对《礼记》所代表之儒家政治哲学范式维度的关注不够集中，或者说从范式角度提炼《礼记》政治哲学特点进而对儒家政治哲学进行反思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我们认为，作为传统礼乐文明的主要文献载体，《礼记》政治思想中还可以提炼概括出儒家政治哲学的某种范式，这种范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用来概括儒家礼乐文明的共性特质。随着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和理解传统的深入，有必要从“范式”角度来讨论《礼记》所代表的儒家政治哲学，以此加深对儒学的理解并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提供历史的借鉴。

基于此，我们希望通过对《礼记》所记述的古典政治制度、日常生活制度与礼治主义信念的理论反思，诠释和重构《礼记》所展现的儒家政治哲学范式，进而讨论日常生活与政治价值观念的联系，思考“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发现政治”以及“政治如何被推行到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为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和传统社会提供一种诠释视角。《礼记》中所记载的礼乐活动都发生在现实的生活场景中，或是政治人物的礼仪生活与日常生活，或是一般平民的礼仪生活与日常生活，而在这种日常的、礼仪性的生活中，政治观念、政治权力和政治价值从没有离场，而是以一种更内在化、具体化的方式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从观念变成了人们的日常遵循。日常的生活体现了儒家差异性政治治理原则，而儒家的差异性原则也被深深地植进了人们的日用常行之中，礼仪生活中的差异性原则体现了政治权力与社会生活嘉益分配的差异性，因而在生活中发现了政治，而政治权力和等级观念也落实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展现出政治权力的力量，成功地将政治观念推行到日常生活中。礼仪制度成功地实现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异化，人们创制了礼仪制度，又用礼仪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动。当然，这种从生活到政治的异化，对于

人类公共生活来说，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了“生活政治”的范式，将其作为“在生活中发现政治”以及“将政治推行到日用常行中”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规范，希望以此来解释儒家礼乐文明的政治哲学意义，同时在现代性的视角下批判分析《礼记》所展示的这种以“差异性”为主导的儒家政治哲学精神，凸显“生活政治”范式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政治治理的意义，并对当代中国出现的“世俗生活与政治价值分离”与“公私不分”的两种极端现象作出回应。

从“生活政治”这一政治哲学范式来分析《礼记》，寻找儒家是如何利用日常生活来落实政治理念，又是如何将政治理念推广到日用常行中的理论解释，从研究创新的角度来看，大概而言，有如下几种设想，或者说希望从如下几个方面取得探索性进展。

第一是希望研究视角有所变化，希望从政治哲学或者政治思想的角度（具体来说就是“生活政治”）对《礼记》展开观念分析，从而呈现《礼记》乃至儒家政治的意义世界，为新时期《礼记》的新解读做一点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对《礼记》之整体性政治哲学的考察。《礼记》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经典，对其展开多维度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从不同视角来审视中国传统。由此，我们期望对《礼记》思想展开整体性的政治哲学研究，发掘其政治哲学维度的思想，从具体的名物度数出发但不拘泥于其中，希望从具体的礼乐制度中抽象出共性的思维趋向，将《礼记》一书作为整体性文本载体来系统反思儒家的政治哲学范式，并考虑儒家是如何借助经典记载和生活实践来促成礼治主义落实之问题。

第二是希望从礼乐文明的解释理论上有所演进，试图揭示《礼记》所展现之儒家“生活政治”的政治哲学范式，阐释儒家的“生活政治”理论。儒家的“生活政治”政治哲学范式在《礼记》一书中表现为从日